

论空间经济学与经济地理学的交集及形成条件

李娜^{1,2}, 伍世代¹

(1. 福建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7; 2. 集美大学 财经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摘要:近 30 年来空间经济学的兴起、经济地理学的复苏在经济学界和地理学界引起了激烈的讨论。为加深对两学科的理解以探讨未来发展的趋势,文章对两者的历史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空间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的交集及其形成条件。研究表明:两者的交叉发展由来已久,从传统区位论到新经济地理学再到演化经济地理学,两者经历了厂商选址均衡、集聚内生增长乃至空间动态多重均衡研究的交集,两者的历史渊源及互补性是交集形成的条件,而进一步交叉发展是两学科未来发展的趋势。

关键词:空间经济学;经济地理学;交集;形成条件

中图分类号:K9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929X(2015)04-0084-07

一、引言

继 20 世纪 90 年代保罗·克鲁格曼(Krugman P.)提出“新经济地理学”^[1]以来,在经济学界和地理学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近期不少学者从研究的前提、研究方法、范围以及框架等方面试图厘清空间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之间的差别^{[2]731-732}。有别于之前的研究,本文认为经济地理学是在经济学的基础上结合地理学的研究产生,而经济地理学又对空间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两者无论在历史还是在未来的发展上均显示出十分明显的交集。因此本文以空间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发展的脉络为切入点,研究两者发展中明显出现交集的阶段,并进一步探讨其形成条件,希望借此加深对两者的理解,以利于对两者未来的发展进行判断。

空间经济学涉及学科领域众多,最突出的是跨越了经济学和地理学的界限,有着极强的跨学科交叉的特点。继帕兰德(Palander)首提空间经济学这一学科名称之后,克鲁格曼首次成功地将空间问题用数学模型进行描述,因此大多数经济学者将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视为“空间经济学”研究框架最终形成的标志^{[3]1067-[4]13}。而经济地理学者则不认为空间问题一定需要经由数学模型描述,空间经济学“是一个松散的学科群,包括土地经济学、环境(生态)经济学、人口经济学、乡村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等”^{[5]563},其发展由来已久。尽管如此,两者都不否认空间经济学研究的问题是资源在空间中的配置和经济活动的空

修回日期:2015-04-13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主体功能区实施背景下的城市群空间重构与优化”(41171147);福建省教育厅(面上)项目“以产业融合促进福建先进制造业发展研究”(JAS14168)。

作者简介:李娜,女,福建泉州人,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博士生,集美大学财经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经济地理和区域经济;伍世代(通讯作者),男,福建松溪人,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城市与区域规划。

间区位选择。因此可以从广义上认为,关于经济活动空间分布规律性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均可归于“空间经济学”的范畴;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空间经济学”可看作是用经济学研究思路 and 手段进行的关于经济活动空间问题研究的学科。

二、空间经济学与经济地理学发展中的三次重要交集

(一) 传统区位论:关于选址均衡的交集

关于空间经济学的源起,学术界存在着不少争议,以梁琦^{[3] 1068-1071}等为代表的经济学者,以杨吾扬^{[5]561}、顾朝林等^[6]等为代表的地理学者,大部分人均认为空间经济学源于19世纪出现于德国的传统区位论。传统区位论是以人类经济活动空间为研究对象的理论^{[7]25-30},源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地租理论和传统的分工学说,是经济地理学以及区域经济学的核心理论。

古典区位论是以完全竞争市场、收益递减以及收益最大化为假定前提,采用静态局部均衡分析探讨个体企业的最优区位选择问题。其开创者德国古典经济学家杜能(Tuner)从区位地租出发,探讨地价不同条件下的农业分带现象,提出了著名的“杜能环”。“杜能环”体现了“距离衰减”和“空间相互作用”的规律,这成为之后区位论发展中重点讨论的两个规律。^{[5]565}此后龙哈德(Launhardt)基于原料、燃料和市场地构造“区位三角形”,个体厂商应据运费最小点进行区位选择。韦伯(Weber)则进一步发展了费用最小点区位选择的理论,提出运费、劳动力和集聚三指向的区位择优理论。^[8]古典区位论以“成本-利润”为出发点,在完全竞争背景下设立模型,分析厂商的选址问题,运输距离是主要的考虑因素,在此前提下运用演绎推理,推导均质空间中厂商选择的局部均衡问题。从本质上说古典区位论属于经济学研究的范畴,也可视为“空间经济学的”的雏形。

传统区位论在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发展背景下进入新古典区位论研究,其以价格为出发点,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法。其代表人物具有经济学和地理学双重素养的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认为在经济地理学研究中,既要注重运用经济学设立模型,又要注重实际的地理调查,一反传统地理学中惯用的归纳法,运用经济学中常用的演绎法研究中心地的空间秩序,形成了市场、行政和运输三原则基础上的中心地系统模型。^{[7]151-162}而俄林(Ohlin)建立了贸易理论和区位理论结合起来的一般区位论,指出工业区位的决定是利息率和工资水平在区域上的差异。^[9]其学生帕兰德(Palander)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空间经济学这一学科名称。^{[3]1068-1069}此后奥古斯特·勒施^[10]、瓦尔特·艾萨德^[11]等学者又不断地对区位一般均衡分析进行补充和发展。

尽管古典和新古典区位论在黑箱操作、空间均质和过于严格的假设、与现实的差距较大等方面受到不少批判,但传统区位论从影响区位选择单要素分析走向区位决策的多要素分析,从成本最小化走向收益最大化乃至最优收益,从局部均衡分析走向一般均衡分析,对抽象空间问题进行逐步深入的探讨,具有严谨的理论逻辑性,揭示了经济活动的空间规律。从区位论发展历史来看,区位理论将经济学与地理学结合起来,形成经济地理学的核心理论基础,也同时促进了空间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因此传统区位论可以视为空间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在历史上的第一次交集,这一历史交集对两学科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 新经济地理运动:关于集聚内生增长的交集

在传统区位论的基础上,经济地理学者不断尝试发展更接近空间现实的理论。以普雷德(Pred)^{[7]144-147}、Day^[12]等为代表的行为主义学派放宽了理性经济人和完全信息的假设,侧重描述不完全信息条件下企业的选址,在一定程度上尝试探讨内生因素对区位选择的影响,但是无法揭示厂商这个点和宏观经济结构之间的联系,于是产生了史密斯(Smith)^{[7]141-144}等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学派。随着柔性生产方式逐渐兴起,Vernon^[13]等提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以及在产品技术发展的不同阶段厂商的区位亦会发生改变,因此更灵活的有利于控制风险的小企业之间的合作更适宜于柔性的生产方式。小企业的合作引起的集聚又引发了关于存在外部经

济的新产业区的探讨。更进一步将研究衍生到引导企业区位活动的制度因素,外部经济网络创新结构引起的文化结构,产业区中企业关系等等,使经济地理学焕发出新的活力,开始了“新经济地理运动”^{[2]731}。其中关于外部经济、创新网络、文化结构、制度厚度等的研究都已将研究视角转移到内生增长方面,这是与传统区位论极大不同的地方,在揭开黑箱问题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上述研究多以个案研究为主,多为描述性的理论。也正因为缺乏模型的研究,空间问题一直徘徊在主流经济学研究的框架之外。直至 Avinash 等^[14]将不完全竞争和收益递增引入,建立 D-S 垄断竞争模型,克鲁格曼在评述经济地理学五大传统——传统区位论、社会物理学、累积循环论、外部经济以及地租和土地利用论的基础上^{[7]359-360}结合 D-S 模型,建立了新经济地理模型(NEG 模型),从而使空间问题纳入规范的经济学模型中,将空间因素引入主流经济学分析框架中。在克氏 1991 年发表的《地理学与贸易》一书中首次将自己的研究定义为“新经济地理学”^[1],希望借此唤起地理学家的重视,但却引发了经济地理学界的巨大争议。1999 年,藤田昌久与保罗·克鲁格曼以及安东尼·J·维纳布尔斯合著《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15],这部专著没有再延续“新经济地理学”的提法,而是直接以“空间经济学”命名。克鲁格曼等人所建立的所有模型都是以数值方法来解决的。在 D-S 模型、冰山成本、动态演化和计算机四个途径的建模策略下,克鲁格曼等建立了空间经济学中的三种基本模型:区域模型(C-P 模型)、城市体系模型以及国际贸易模型^{[3]1071-1077}。C-P 模型放弃了传统的基于完全竞争理论的外生因素分析论,转向以不完全竞争理论为基础的内生因素的研究,试图解释不同地理空间上经济集聚产生的原因^{[4]13},即在“本地市场效应”、“价格指数效应”、“市场拥挤效应”三机制共同作用下,集聚和分散的力量产生的合力,引起一地企业数量的变化,从而产生集聚和分散的现象^[16]。后两个模型是在 C-P 模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进一步关注了均质的“无缝世界”中城市圈层布局以及国际贸易引致的特定产业的集聚和分散,完成了俄林和艾萨德没有完成的工作——将国际分工理论、区位论结合起来,用数学范式将空间因素引入了主流经济学的演绎推理中,这成为空间经济学发展史上的丰碑,也可视为空间经济学地位最终确立的标志。但 C-P 模型的假设过于严格,有些假设不切实际,且过于依赖数值,因此许多经济学家不断改进 C-P 模型的假设,引入新的生产要素,且不断改进模型的可操作性,他们从不同角度解释了经济集聚的内生演进过程,如从要素流动^[17-19]、资本创造^[20-22]、中间投入品^[23-24]等方面设立模型,以及为了克服 DIC^①框架下非线性函数引致相关变量无法导出解析解的缺陷而设立了关于厂商预竞争的线性模型^[25-26],这些模型极大地丰富了空间经济学的理论,奠定了分析经济活动空间分布规律的基础,形成了空间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虽然克氏对所作研究命名的提法引起了争议,但也鲜有经济地理学者将克氏等的研究排除在“新经济地理运动”之外,对空间问题尤其是空间内生增长因素的研究使空间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形成了历史发展上的第二次交集。“新经济地理运动”对空间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的贡献不可谓不大,它从多个角度多个要素来探讨空间集聚和扩散的问题,尤为关键的是对集聚和扩散形成的内生机理进行了探讨,这对于区位布局和制度安排具有十分现实的指导意义。在对内生因素的多视角探讨中也不断丰富了研究的手段,如果说经济地理学的多维转向侧重于异质空间个案的观察和描述性研究,那么空间经济学则侧重于均质空间定量的研究和寻找一般性的规律,两者既有交叉性又有互补性,体现了经济学和地理学学科交叉发展中的重要成果。

(三) 演化经济地理学:关于空间动态多重均衡的交集

兴起于 20 世纪 70 年代、流行于 80 年代的演化经济学引入了生物学的进化理论,吸收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和普雷德等的行为主义理论,以历史作为发展研究的起点,将历史的遗传——惯性累积、路径依赖等,优胜劣汰的适应性竞争——选择竞争、学习、模仿及创新等作为研究的核心^[27]。有别于新古典经济学完全理性经

①DCI 是指迪克希特-斯蒂格利茨(D-S)垄断竞争、不变替代弹性(CES)效用函数和冰山贸易成本。

济人、利润最大化及经济均衡的思想,演化经济学将“非均衡”视为常态^{[28]618},在有限理性的前提下研究学习、技术创新、组织变革、制度及社会变化等微观和宏观的相互联系作用,强调经济的演化是一个不可逆的动态过程。“演化经济学与经济地理学在制度、文化、关系转向上的交织”^[29]引起经济地理学界的浓厚兴趣,经济地理学在多维转向的基础上又出现了演化主义的转向——关注多个层面上企业区位演化、集聚、外部性、网络结构、城市与区域发展的空间演化乃至与制度的协同^[30]。以 Boschma 等^[30-31]、Martin 等^[32] 等为代表的演化主义学派认为,演化经济地理学开辟了继多维转向、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之后经济地理学发展的“第三条道路”,有助于发展经济地理学的一般理论,可以用于对特定时间和空间的实证检验。但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描述性的创新体系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以及“形式化建模的技术演变研究”^{[28]620}方面。有别于以往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演化经济地理学以有限理性为前提,动态均衡分析为一般范式,以“积累”、“学习”、“动态性”、“路径依赖”、“创新”为核心,讨论集聚为何会产生,这与克鲁格曼等认为的集聚之所以会在一地产生是“历史的”“偶然性”的事件有着本质的不同。

这是否意味着演化经济地理学与空间经济学就此分道扬镳?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首先从克鲁格曼等所做的研究来看。克氏等的研究虽然仍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下结合报酬递增和外部性进行的,但其与演化经济学一样强调:企业的关联和外部性决定了企业的区位选择;区位选择 and 市场竞争机制而非要素的价格决定了企业空间分布的差异;集聚具有自我强化的动态演进过程,这种历史演变是不可逆的;累积循环和路径依赖是集聚形成的关键因素;经济活动的空间存在着多重均衡^{[33]1977}。其次,从近期空间经济学的研究来看。近期的空间经济学研究在第一代空间经济学模型基础上一方面逐渐放宽了假设前提,如对工人偏好和技能的异质性考察,揭示了利润最大化以外因素对空间选择的影响;对空间的异质性考察,指出初始地理条件不同引致比较优势的不同;对企业异质性的考察,揭示企业跨区域与国界运动的现实等^{[4]16-17}。另一方面,则开始考虑知识和技术以及动态增长的效应,如 Fujita 等^[34]建立了两区域内生增长模型,试图将经济关联和知识关联融合起来,创新因素尤为显眼。加入了创新因素的模型显示出集聚可能带来的帕累托改进,核心和边缘地区的人口都可能因此受益,只是受益的程度不同^[35]。空间经济学的发展亦逐步考虑偏好、空间异质、动态增长和知识关联的效应,这与演化经济地理学关注的问题有着共通之处。空间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第三次交集已然存在,并可能在未来的研究中发挥出交叉发展的优势。

三、空间经济学与经济地理学交集的形成条件

空间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交集的探讨揭示了两者之间密切的关系,探究历史得以更深入地理解两学科的发展。两学科发展历史上的同源性、关注对象的同质与同步性及研究方法 & 政策启示上的互补性预示了未来交叉发展的可能性。

首先,从两学科发展的渊源及关注对象来看。新古典经济学是空间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发展的基础,传统区位论关于厂商选址问题的研究在理性经济人、完全竞争和均质空间等前提下,以“成本-利润”及“需求-价格”为出发点进行决策均衡分析,促进了两学科的形成。此后在垄断竞争发展的背景下,以及主流经济学研究模型化的趋势下,克鲁格曼等以数理模型构建了经济和地理联接的空间经济学研究框架,进一步将主流经济学研究的视角衍生到地理学中;而经济地理学则认为经济的活动应“嵌入”到社会的政治、制度、文化中,经济活动选择的出发点不应仅是利润的最大化,而应是各种关系作用的结果,有着多样性,在发展新经济地理学的同时也将视角映射到经济学的制度主义关注点上。两者之间探寻同样的问题,即从内生增长方面研究构成经济活动的空间规律中“累积循环”效应的成因,形成了和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的传统区位论并行的研究体系。而演化主义是在新古典主义和制度主义的交织中发展起来的^{[28]617},致力于研究为何一地会产生“累积循环”,“累积循环”将会如何发展,为解答困扰空间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运动的“历史偶然因素”、“动

态发展”等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其次,从两学科发展上呈现的互补性来看。空间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从抽象的经济背景出发,设定假设前提,进而做出制度安排,推导均衡结果,并进行评估与比较^[36],更倾向于探索普适性较强的经济活动的空间规律,得出的一般性的结论,进而做出制度安排,经济增长、产业发展、区域经济以及国际贸易等问题都可以在这个框架中进行分析。然而正是由于假设的前提过于严格,且过于依赖数学模型而不考虑无法纳入模型的因素,造成对空间的异质性解释过于薄弱,影响了制度的安排。许多空间经济学者日益意识到这一点,也在不断尝试运用多种方法设立更具有政策启示意义的模型,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则是一个很好的启示。经济地理学者的研究范式是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尽可能全面地收集自然条件、社会状况、经济景观、文化制度等方面的资料进行详实的研究,而后就分析的原因提出对策建议,在此基础上进行规律的总结和理论的升华^{[2]735-736},这对于企业的布局选址,土地利用、人口功能区、主体功能区的规划等方面有很高的应用价值。目前演化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则更是从历史的动态方面解答了空间经济学尚无法突破的产业为何在一地集聚,累积循环在特定区域为何无法持续,以及产业如何转移乃至转移到何处的问题^[37]。但由于各个研究区的复杂性,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较难抽象出一般化的规律,对宏观的政策安排造成了影响。由此可见,经济地理学范式为空间经济学在异质性上的努力提供了很好的借鉴,而空间经济学范式又为经济地理学提供了对一般规律探索的方法,两者具有极强的互补性。

最后,从两学科未来的发展来看。空间经济学未来的发展,大约有三个方向,一是扩展理论菜单,放宽假设前提,引入新的因素;二是进行实证研究,对理论进行证实或者做出修改,探讨政策含义;三是探讨建立新的模型,以期克服现有模型缺陷^{[3]1077-[4]17}。空间经济学试图使理论框架贴近现实、具有更强的解释性,除了在现有模型框架上进行完善,还需要借鉴经济地理学对差异和特例区域的研究。对于演化经济地理学来说,兴起之后的研究都较为零散,只有近几年才在厂商集聚、外部性和制度的作用方面取得了较为重要的进展^{[33]1976},但丝毫不减其对经济地理学的吸引力,经济地理学希望借由演化经济地理学将主流经济地理学“从过分的文化转向中找回其空间科学和行为地理学的传统”^{[28]621},这也需要演化经济地理学借鉴其他学科尤其是经济学的研究成果^[38],发展中的空间经济学是一个相当接近的选择。空间经济学在演绎推理和数理模型上的优势有助于演化经济地理学设立完整的研究体系,进行更为严谨的推理分析。另一方面,演化经济地理学对于有限理性,多重均衡等的假设与空间经济学的研究进程不谋而合,演化经济地理学在案例实证分析上的优势又可以促进空间经济学对于多因素和异质性的探讨,从而进一步完善空间经济学的体系。因此可以大胆地预测空间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未来必是合作交流、交叉发展的。

四、结 语

空间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同源性,国际经济理论和区位论的交融首开经济学和地理学历史交叉发展的基础,克鲁格曼等将空间的概念引入了经济学标志着主流经济学与经济地理学再度交通联接的趋势,而演化经济地理学更是具备了将空间经济学、经济地理学更紧密地联接在一起的可能,并在此基础上往更具现实解释力的方向发展。两者的交集从厂商选址均衡到集聚内生增长的均衡乃至空间动态多重均衡,反映了空间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研究眼光的一致性。两者都是为了解决人类生产生活在空间分布上的规律性问题,空间经济学在构建理论框架、运用模型进行演绎推理方面的优势值得经济地理学借鉴;经济地理学对现实世界更贴切的研究也有助于空间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和思路拓展,两者具有极强的互补性,彼此的交流合作有助于各自学科的纵深发展,而交叉发展是两学科未来发展的趋势。

参考文献:

- [1] 克鲁格曼 P. 地理和贸易[M]. 张兆杰,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1-31.
- [2] 胡志丁, 葛岳静. 理解新经济地理学[J]. 地理研究, 2013, 32(4): 731-742.
- [3] 梁琦. 空间经济学: 过去、现在与未来——兼评《空间经济学: 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J]. 经济学, 2005, 4(4): 1067-1086.
- [4] 李胜会, 冯邦彦. 对国外空间经济学集聚经济理论研究的分析: 兼谈城市集聚理论的发展[J]. 经济问题, 2008(2): 13-19.
- [5] 杨吾扬. 经济地理学、空间经济学与区域科学[J]. 地理学报, 1992, 47(6): 561-569.
- [6] 顾朝林, 石爱华, 王恩儒. “新经济地理学”与“地理经济学”: 兼论西方经济学与地理学融合的新趋向[J]. 地理科学, 2002, 22(2): 129-135.
- [7] 李小建. 经济地理学[M]. 2版.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25-360.
- [8] 吴传清. 论任美镔关于韦伯工业区位理论的研究[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07(4): 27-33.
- [9] 王岚, 罗小明. 从俄林到克鲁格曼: 区位对贸易意味着什么? ——区际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的比较[J]. 当代财经, 2012(12): 104-111.
- [10] 勒施 O. 经济空间秩序[M]. 王守礼,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44-335.
- [11] 艾萨德 W. 区域科学导论[M]. 陈宗兴, 译.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0: 40-238.
- [12] DAY R H. Adaptive Economics in Crosby R W. Cities and Regions as Nonlinear Decision Systems[M]. US: Westview Press, 1983: 103-142.
- [13] VERNON 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oduct Cycle[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66, 80(2): 190-207.
- [14] AVINASH K D, JOSEPH E S.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 Diversity[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7(6): 297-308.
- [15] 藤田昌久, 克鲁格曼 P, 维纳布尔斯 A J. 空间经济学: 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M]. 梁琦,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1-32.
- [16] 安虎森, 蒋涛. 块状世界的空间经济学: 空间经济学点评[J]. 南开经济研究, 2006(5): 92-103.
- [17] MARTIN P, ROGERS C A. Industrial Location and Public Infrastructure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5, 39(3/4): 335-351.
- [18] FORSLID R. Agglomeration with Human and Physical Capital: an Analytically Solvable Case [Z]. CEPR Discussion Paper No. 2102, 1999.
- [19] FORSLID R, OTTAVIANO G I P. An Analytically Solvable Core-periphery Model [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03(3): 229-401.
- [20] BALDWIN R. Agglomeration and Endogenous Capital[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9, 43(2): 253-280.
- [21] MARTIN P, OTTAVIANO G I P. Growing Locations: Industry in a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9, 43(2): 281-302.
- [22] BALDWIN R, MARTIN P, OTTAVIANO G I P. Global Income Divergence, Trade and Industrialization: The Geography of Growth Take-off [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01(6): 5-37.
- [23] KRUGMAN P, VENABLES J. Globalization and the Inequality of Nations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5, 110(4): 857-880.
- [24] FUJITA M, KRUGMAN P, VENABLES T. The Spatial Economy: Cities, Reg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9: 75-95.
- [25] OTTAVIANO G I P.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Trade, and Endogenous Spatial Fluctuations[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2001, 31(1): 51-77.
- [26] OTTAVIANO G I P, TABUCHI T, THISSE J-F. Agglomeration and Trade Revisited [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2002, 43(2): 409-435.
- [27] 刘志高, 崔岳春. 演化经济地理学: 21 世纪的经济地理学[J]. 社会科学战线, 2008(6): 65-75.

[28]苗长虹. 欧美经济地理学的三个发展方向[J]. 地理学报, 2007,27(5):618-623.

[29]BOSCHMA R A, LAMBOOY J G. Evolutionary Economic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1999 (9): 411-429.

[30]BOSCHMA R, FRENKEN K. Why is Economic Geography not an Evolutionary Science? Towards an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06,6(4): 293-302.

[31]BOSCHMA R, FRENKEN K. The Emerging Empirics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J]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1(2): 295-307.

[32]Martin R, Sunley P. Path Dependence and Regional Economic Evolution [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2006,6(4): 395-437.

[33]李福柱. 演化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框架与研究范式:一个文献综述[J]. 经济地理,2011,31(12):1975-1994.

[34]FUJITA M, THISSE J-F. Does Geographical Agglomeration Foster Economic Growth? And Who Gains and Who Loses From It? [J]. The Japanese Economic Review, 2003,54(2): 121-145.

[35]殷广卫,李洁. 空间经济学概念及其前沿:新经济地理学发展脉络综述[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 (1):75-82.

[36]田国强. 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J]. 经济研究, 2005(2): 113-125.

[37]颜银根,安虎森. 演化经济地理:经济学与地理学之间的第二座桥梁[J]. 地理科学进展,2013,32(5):788-796.

[38]晁毓欣,亓亚丛. 我国经济学研究全景展示:基于《经济研究》2002-2013年间的JEL统计分析[J]. 山东财经大学学报, 2015,27(1):86-92.

Intersection between Spatial Economics and Economic Geography and Its Formation Conditions

LI Na^{1,2}, WU Shidai¹

(1.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2. Schol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China)

Abstract: The rising of spatial economics and the recovery of economic geography in recent 30 years have attracted heated discussion in economic and geographical circle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two disciplines and analyzes the intersection between spatial economics and economic geography and its formation conditions so as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two disciplines and explore their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s. The research findings show that the cross development between spatial economics and economic geography exists for a long time, and from traditional location theory, new economic geography and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both of them have experienced such intersections as the vendor location equilibrium, agglomeration endogenous growth and spatial dynamic multiple equilibrium, and that their historical origins and complementarity are the formation conditions for their intersection formation while further cross development i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two disciplines.

Keywords: spatial economics; economic geography; intersection; formation condition

(责任编辑 时明芝)